

- 从孔子到王国维，
集中国古代文论家之精英。
- 从资料到研究，
代表当代古文论研究之最高水平。



中国古代 文化家评传

上册

牟世金 主 编



中国古代 文论家评传

上册

牟世金 主编

中州古籍出版社

中国古 代文 论家评传

下册

牟世金 主编

中州古籍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分上、下两册，分别评介了从战国至晚清六十七位文学理论家的生平事迹和文学理论著作。本书不仅集中国古代文论之精华，也可说是集近年来古代文论研究之大成，显示了古代文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同时又是古代文论研究的一个新起点。

中国古代文论家评传 车世金 主编

责任编辑：郑 荣 壴 健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花园路54号楼)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开本 36.125印张 839千字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 册

ISBN7—5348—0032—3 I·18 定价：14.15元

序

程千帆

我国古代文论发端于先秦，而兴盛于魏晋南北朝。从曹氏兄弟直到刘勰、钟嵘，他们不但对文学创作及基本上与之同步发展的文论在理论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而且对于如何表达这些理论，也同样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如晋朝挚虞撰《文章流别》，分为集、志、论三个部分：集是作品，志是传记，论是理论批评。他把这三个各有侧重面而又互相关联的组成部分，构成一个整体，就能够比较完整地体现其所涉及的历史时代的整个文学风貌。挚虞这一创造性的工作，对于后世文论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

建国以来，我国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的光辉照耀下，继承和发扬了前代学者的优良传统，对古代文论的研究做出了很大的成绩，有关这方面的书出得不少。我们已经有了《中国历代文论选》这种相当于“集”的书，有了各家《中国文学批评史》这种相当于“论”的书，现在牟世金先生又主编了这一部相当于“志”的《中国古代文论家评传》，这将使我们更完整地看到中国古代文论的全貌。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参加撰写这部书的学者多达五十余人，包括老中青三代，有卓负盛名的老一辈学者，也有近年来崭露头角的新秀，所以此书的出版，无异是一次古代文论研究成绩的综合展览。这部集体撰

DD/5/12

2

写的书可能还有另外一种特色，就是在论述中开展了百家争鸣。我们对于古代文论家的评价，在学术界并不是都取得了一致的意见的。如果这部书由一个人来写，作者就必然有一个统一的观点，这种统一的观点有时也不免产生“安于所习”、“崇其所善”之弊。而照现在这样的安排，则不但完成了本书应负的使命，且汇集研究者的各家之长，为读者提供了较大的方便；而使用这种方法，也是一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实践，对此后古代文论的研究会起到推动作用。

世金先生早年跟陆侃如先生学习，研究《文心雕龙》，卓著成绩，蜚声海内外。对这部《中国古代文论家评传》的编纂，显示了他已由一个研究者进而成为一个研究工作的组织者。对此，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对于古代文论，我曾经走马观花，实未升堂入室，偶然有些想法，因为年老力衰，也没有能够及时写成文章，求教同行。看到世金先生勇猛精进、日新月异的成就，真感到既安慰又惭愧。

一九八六年二月谨序

前　　言

牟世金

近年来，古代文论研究以每年发表四、五百篇论文，出版十多部专著的速度发展，已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除了当前整个学术思想空气的活跃外，这种大发展的重要原因有二：一是中国古代确有十分丰富的文论资料，用新的观点和方法去发掘、清理和研究，真是使人应接不暇，美不胜收。人们愈来愈发现有其值得珍视的价值，愈来愈深知它确可激发起我们的民族自豪感。不少外来的时髦之论，其实我国古已有之；把陆机、刘勰、金圣叹、李渔等人的理论成就，放到同时期的世界文坛上略加比较，就发现我们这个文明古国，在文论方面是毫不逊色的。

再就是我们的国家民族应该走自己的道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这一光辉思想指导下，广大文艺工作者普遍意识到，建立具有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已是刻不容缓了。文学理论是创作经验的总结。我们只能总结自己的经验来指导自己的创作，强搬西方的经验，硬套现代派的理论，不过把中国的文坛变成西方的应声虫。

历史的经验早已证明，全盘西化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在文学理论这块沃土上，我们是富有者。如果抛弃数千年来的优秀传统，而要“和传统告别”，那就是从零开始。任何高明的仰人鼻息者，也只能永远跟在人家的屁股之后。我们并不盲目拒绝一切

有益的外来东西。六朝文论的大发展，正与外来的佛学、新兴的玄学有关。但六朝时期的文论没有一部不是地道的中国文论，没有一家之言不是在传统经验的基础上重新构筑的。当前，多数古代文论研究者正在努力掌握新的思想方法，也积极而慎重地吸收西方的某些有利因素，却深知发扬民族文学的优良传统，在现在更负有光荣的历史使命。所以，近年来古代文论研究的勃兴，并非出于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今天，为了明天，为了民族文学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走自己的路，文学艺术及其理论自不能例外。按照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要求，近年来古代文论的研究虽已有了很大发展，但还非常不够；关心此道者，也还总是少数。没有千百万文艺工作者的共同认识和努力，这一要求是很难实现的。

要使浩如烟海的古代文论为广大群众所理解和掌握是不可能的，只能首先向他们介绍一些最重要的、有代表性的东西。怎样把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汇集起来，借以推广和促进古代文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困难也是很大的。但古代文论的研究者们正在积极思考，出版家们也在千方百计想办法。近年来，除大量出版了各种专书的校注释译和研究著作外，研究者的论文集、专题性的研究集（如小说理论等）、专家专书（如刘勰、严羽、王国维等）的论文选，也正在陆续出版。这类论著今后必将愈来愈多，这自然是大好事。但仅以《文心雕龙》一种来说，迄今中外出版的研究专著已多达百多部，发表论文一千六、七百篇，总计不下三千万言。而中国古代文论家较重要的也有二百余位，当代著名的研究者，也不下三百人。这对一个想要涉足古代文论的人来说，真就是“翘足志学，百首不遍”了。

所以，为了使广大读者能较为集中地接触中国古代文论的主

要成就，又可得当代研究者的各家之长，既配合历代文论选的教学之需，又可提供广大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参考，中州古籍出版社决定出版这部《中国古代文论家评传》。本书选古代文论家六十七人，最重要的论著都在其中了；本书邀请当代著名的研究者和少数新起之秀共六十人执笔，除个别名家为时间所不允而未预其撰外，海内名流大都为此书捉笔了。研究者一般是各有所长的，或为研究某一论著的专家，或当前正集中研究某一论著；本书基本上就据此分工执笔而发挥各家之长。所以，本书不仅集中中国古代文论之精华，也可说集近年来古代文论研究之大成。这对读者或研究者提供的方便是明显的。

“知人论世”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传统之一。这部《评传》也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传统。其不能不继承者，盖以中国古代文论鲜有孤立的、纯理论性的论著，而往往有其具体的针对性；或为反对某种不良倾向而发，或为总结某种创作经验而撰，其主张与批判、建树或论战，大都与当时文坛风气息息相关。所以，离开其特定的历史状况和论者的思想阅历，是难以准确把握古代文论的实际意义的。本书宗旨虽以评论各家理论成就及其意义为主，也注意介绍古代文论家的生平思想及有关历史背景。这对一般读者来说，可能是更为必要的。但这只是就其大概而言，古代文论家的具体情况各不相同，其理论与时代的联系强弱不一；有的家只一部专著，有的则针对多种情况提出不同的评论，有的甚至一生前后观点不一。因此，本书的内容和体例都无法强求一律，只能是大致取知人论世之途，而以论述各家的理论意义为主。

与此有关的问题是：中国古代基本上没有专业的文学评论家，大都是作家、诗人、思想家，或政治家兼行文学评论。我们

在介绍其生平思想时，虽也兼顾全人，却不可能按照诗人、政治家或思想家的面目着笔。本书既是古代文论家的评传，就只能侧重从文论的角度来写其生平思想。如杜甫、王安石等，也适当联系其诗作以印证他们的文学观点，但对其创作活动、诗歌成就、政治生活等，就不作详细介绍了。

正如程千帆先生在本书序中所说：“此书的出版，无异是一次古代文论研究成果的综合展览。”这不仅指明了本书集各家之长的综合性，而且是古代文论研究成果的“综合展览”。这是始料未及而实有的意义。这里的展品，绝大多数确是撰者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成的，它确是显示了古代文论研究的新成果。虽然，其中难免会有某些未当之处，也必有某些更优异的成果为本书所遗，但欲求其全而必当是永远不可能的；我们的态度是尊重作者以存一家之言，某些有分歧的问题是难作定论的。这本书绝非古代文论研究的终点，但我相信，从全书总体上看，它将成为古代文论研究的一个新起点，在古代文论研究的发展过程中，起到应有的推动作用。

本人愧为“主编”，以上所说，实无意于贪天之功。这本书的主旨是中州古籍出版社确定的，我不过是起一点联络作用而已。1985年秋，在福建的全国严羽讨论会中，中州古籍出版社孟庆锡社长拟委以此任，我当时还未敢受命。但经古文论界同仁的不断鼓励与督促，乃于是年底初拟选目，与出版社和部分古代文论研究者商议，程千帆、穆克宏、滕咸惠、蒋凡，和出版社的袁健等，都先后对选目提供过许多具体意见。而这本《评传》得以完成，更主要是得到全国二十四所大学和许多研究机构研究者的鼎力支持，承他们在繁忙的工作中撰成诸稿。特别如钱仲联先生，他是在重病中坚持完成的，上午寄出稿件，下午就住院

了，顾易生先生当时正在日本讲学，亦远从国外复示，同意撰写；又如陈曦钟、黄霖二位，都是在即将赴日讲学之前的诸事丛集中完成的；莫励锋博士要去哈佛大学进修，则提前两月完成所应稿件。他们对此书的重视，于此可知。又如周振甫先生，虽以其它要事不能分身，仍十分关注此书，特为推介他认为堪当其任的同志执笔。此外，许多“卓负盛名的老一辈学者”，除上述程千帆、钱仲联外，如杨明照、徐中玉、霍松林、吴调公、李健章、万云骏、蒋祖怡、张白山等，都抽出他们的宝贵时间为本书撰稿。所有这些，不仅为出版社和我个人十分感激，我想，广大读者也会深以为感的。

最后，由中州古籍出版社邀请霍松林、侯敏泽（因事未到）、牟世金、罗宗强、张少康、夏写时、刘文忠等集体审定书稿。为了统一全书，经审稿人共同研究，对稿件做了某些技术性的处理和删削。若有未当，这是要请原作者谅解的，为了早日付排，来不及逐一征求意见了。本书责编郑荣和袁健同志，最后又查核原文，改正一些不确的引文，做了大量细致的编辑工作，才使本书能以较为理想的面貌和读者见面。

目 录

序	程千帆	(1)
前 言	牟世金	(1)
孔 子	敏 泽	(1)
孟 子	顾易生	(21)
庄 子	蔡钟翔	(41)
荀 子	敏 泽	(61)
司马迁	蒋 凡	(76)
扬 雄	毕万忱	(96)
王 充	蒋祖怡	(113)
班 固	刘文忠	(127)
曹 禤	张可礼	(145)
陆 机	张少康	(160)
挚 虞	牟世金	(177)
葛 洪	杨明照 曹顺庆	(191)
沈 约	穆克宏	(206)
刘 碩	牟世金	(222)
钟 嵘	萧华荣	(251)
萧 统	穆克宏	(267)
颜之推	刘文忠	(282)

刘知几	牟世金	肖洪林	(297)
杜 甫	郑庆筠		(316)
皎 然	陈熙中		(334)
韩 愈	罗宗强		(347)
白居易	霍松林		(365)
柳宗元	吴文治		(387)
李商隐	吴调公		(403)
司空图	祖保泉		(418)
梅尧臣	吕美生		(437)
欧阳修	朱大刚		(449)
苏 淳	曾枣庄		(470)
王安石	张白山		(485)
苏 轼	徐中玉	谭帆	(502)
黄庭坚	莫砺锋		(518)
李清照	王廷梯		(532)
张 戒	张连第		(546)
朱 烨	成复旺		(560)
姜 瘗	贾文昭		(579)
王若虚	霍松林		(592)
严 羽	陈伯海		(605)
元好问	蔡厚示		(625)
张 炎	滕咸惠		(638)
何景明	成复旺		(647)
谢 榠	朱思彬		(655)
王世贞	赵永纪		(672)
李 贽	陈谦豫		(687)

屠 隆	徐季子(704)
汤显祖	夏写时(717)
胡应麟	王先霈(732)
袁宏道	李健章(747)
王骥德	叶长海(767)
冯梦龙	严云受(786)
金圣叹	黄 霖 吴兆路(803)
王夫之	肖 驰(828)
毛宗冈	李茂肃(845)
李 渔	杜书瀛(863)
叶 煊	蒋 凡(884)
王士祯	陈祥耀(900)
张竹坡	王汝梅(917)
沈德潜	王镇远(932)
袁 枚	胡 明(946)
姚 翁	钱仲联 马亚中(961)
翁方纲	王志英(996)
章学诚	王冰彦(1010)
龚自珍	郭廷礼(1023)
刘熙载	邱世友(1042)
陈廷焯	邱世友(1068)
况周颐	万云骏(1088)
梁启超	夏晓虹(1104)
王国维	滕咸惠(1124)

孔 子

敏 洋

一、生平和思想

孔丘（前551～前479）^①，字仲尼。孔子的先祖孔父嘉，是宋国的宗室。孔父嘉被华父督无辜杀害，其后世便逃至鲁国，世为鲁人。父字叔梁纥，陬邑（今山东曲阜）人。

孔丘自己曾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吾不试，故艺。”（《论语·子罕》，以下引自《论语》者，只注篇名。）可见他幼年时期，家境并不富裕，学会了一些劳动的手艺。“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为政》），从十五岁立志学习。二十岁以后，作过两次小官：一次做过会计的官吏，一次做过管牛羊的乘田，并且都做得很好。

孔丘不仅自幼广泛地学习以前的文化典籍，所谓“信而好古”（《述而》），而且善于学习别人的长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同上）并且不耻下问：“每事问。”（《八佾》）三十岁左右，学问已相当成熟，开始聚徒讲学。在这之前，由于学在官府，一般社会下层的人，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教育完全为贵族所垄断。春秋中期以

^①这里从《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之说。《史记》作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2年），相差一年。

后，由于历史的发展，自由民与自由工商业者开始出现，并普遍希望学习文化，参与政治，孔丘适应着这一历史要求，开始了历史上第一次的讲学事业。

孔丘开创私学，以“有教无类”（《卫灵公》）为原则。他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他的学生中除少数富有的贵族外，如颜回、子路、子张、闵子骞、原宪等等，大多都是出身贫寒之士。他培养了大批学生，为文化教育的普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孔丘三十岁时，正是郑国政治家子产病死的一年。尽管孔丘对当时的许多政治家都有不同程度的批评，但对子产一直怀着很深的尊重。他十岁左右时，由于乡校议政，当时有人建议毁掉乡校，子产认为民众议政是好事，子产拒绝了这一建议，并说：

“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①孔丘听说这件事后，对于当时一些人非议子产很不赞成，并说：“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②子产在世时，曾经实行过一些政治改良（如“作丘赋”、铸刑书、整理田制、限制贵族等），对于“天”，子产也是主张“天道远，人道迩”^③的；对于“礼”，子产一方面虽然也很强调，但是又很强调“民”在礼制中的地位，所谓“民之所好也”等等。孔丘显然是赞同子产这一开明政治家的政治措施和主张的，并且在他的思想的形成中，也受到子产思想的一定影响，所以，在子产死后，他不仅感到深切的哀痛，而且一直对这位政治家怀着深深的景仰。《孟子》记载说：“子谓子产，有君子之四道焉：其行已

^{①②}《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③《左传·昭公十八年》。

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公治长》）给子产以极高的评价。

公元前517年，孔子离开鲁国去齐国，宣传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被接受，不久又返回鲁国。他继续宣传自己的学术政治观点，在公元前501年51岁时，被鲁定公任命为中都宰相（相当于后世的京兆尹），一年之后，政绩显著，升为司空，再升为司寇。并以相礼资格参加了齐鲁的夹谷之会，赢得了收回郓、灌、龟阴三个城池的外交胜利。

鲁定公十二年左右，孔丘乘季孙氏等三家之乱，提出了削弱三家公卿专权的“堕三都”的建议，并以司寇的地位，派子路为季孙氏家宰，主持堕三都的计划。虽未彻底完成，却终于堕了叔孙氏、季孙氏盘踞多年的郈和费城。终于削弱了三家公卿的势力，改变了长期以来三家专权的局面，使鲁国在政治上出现了一个暂时稳定的局面。

这一局面的出现，引起了齐国的担忧。齐景公便使离间计，乘机挑拨鲁定公对孔子的信任。于是，在定公十三年（前497年），孔子便率领弟子离开鲁国，开始了周游列国的行程。

孔丘离鲁后，首先到了卫国。但卫灵公由于听信谗言，传说曾派人对他进行监视，孔丘住了十个月，就离开了卫国。离卫后路经匡地（今河南长垣县），由于匡人误认为他是阳虎，而阳虎在鲁定公六年时，曾攻打过匡人，所以匡人包围了孔子。后来误会消除，才得以解围。

孔丘离开匡城，不久又返回卫国。由于卫灵公荒淫无道，年老昏愦，所以尽管外表上很尊重他，但实际上并不予以重视。他于鲁哀公三年（前492年）再次离开卫国。

孔丘离开卫国后，到了陈国。这时在位的陈湣公也无所作